思语

文创就该“玩”起来

□ 李 丹

《创意中国》在制作时既保持了文化独有的阳春白雪，又具备了电视栏目的市场化表达，融入了创投节目的专业表述

2017年，北京卫视一档文化创意创投类综艺节目《创意中国》开播，两年来已经有两季节目与大家见面。从收视情况来看，第二季《创意中国》实现连续3周蝉联卫视晚间黄金档栏目收视第一，优酷、腾讯两家视频平台前6期节目播放量累计近1亿，此前还获得新浪微博2018年综艺大赏“人气文化类节目”第二的好成绩。观众的选择印证了节目的高品质。

这是一档什么样的综艺节目，能引起大家如此关注？近年来文化综艺虽然异常繁荣，但叫好又叫座依然不易。一方面是节目种类繁多，分散了观众的注意力；另一方面是涉及文化创意类的综艺节目，给人的第一印象往往偏于“高冷”，知识性有余而趣味性不足，很难“接地气”。《创意中国》这档栏目却创新性地改变了这一局面。

笔者印象最深的是《清明上河图》那期。这幅来自宋朝的传世名画曾经引发过“故宫跑”，来自全国乃至世界的文化爱好者不惜排上数小时长队，只为一睹它的“芳容”。而文创者带来的“清明上河图3.0”文化项目，不仅能让观众随时可以看到这幅珍品，还通过与科技结合让古画“动起来”，甚至能让观众“走进”画中，体验宋朝的“五星级酒店”——孙羊正店的服务。

为了能吸引更多年轻人的目光，《创意中国》不仅在文化创投项目内容上下功夫，还打造了新颖且颇具趣味性的形式。由58同城CEO姚劲波和著名主持人华少各带领一支战队，分庭抗礼的赛制让两位嘉宾之间“火花迸发”。为了让自己的战队项目赢得胜利，他们使出浑身解数，为节目贡献了不少金句、笑料。此外，具有科技感的舞台搭建、战队赛的悬念重重、嘉宾的互动体验等细节把控和赛制规则，大大增加了节目的可看性。

作为一项文化创投类节目，《创意中国》在制作时既保持了文化独有的阳春白雪，又具备了电视栏目的市场化表达，融入了创投节目的专业表述。虽然近年来文化综艺大行其道，但由于节目与大部分快消品商家难以匹配的市场现状，导致节目招商情况不甚乐观。不过两季《创意中国》却均获得了不少优质广告商的青睐，可谓在严肃综艺领域“一枝独秀”。这又是什么原因呢？

广告方在选择赞助一档节目时，考虑的无外乎两点：一是高收视率的保障；二是品牌定位与产品属性和节目气质相匹配。据出品方介绍，《创意中国》实际上依托于近年来火热举办的“北京市文创大赛”。该赛事自2016年创办以来，3年多的培育让人们对文创概念已经有了想要了解的热情。大赛2018年已走进22个省市，最高到拉萨、最南到海南，还有来自宝岛的台湾赛区。全国各地的文创项目为第二季《创意中国》提供了充足、优质、有代表性的文创项目。同时，节目以“创意”为核心，与诸多企业创业过程中经历的“以创新求发展”，以期走向更广阔市场的发展战略相吻合。从这个角度看，《创意中国》无疑赢在了起跑线上。

在助力项目与资本对接方面，第一季《创意中国》短短3个月的录制时间里，就有12家参赛团队与现场投资机构确定了合作意向。第二季节目又继续加大与市场接轨的力度，带动数十亿元参投资金，撬动超过百亿元的产业并购资金，为创业者带来务实的扶持，实现经典文化传承、投融资精准对接，让社会效益和商业价值双丰收。

责任编辑 李 丹 敖 蓉

美术编辑 高 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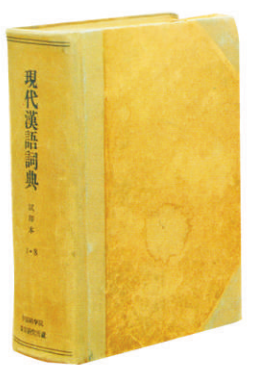
邮箱 jjrbzmzk@163.com

《现代汉语词典》：

一本书的“甲子往事”

□ 杜 翔

☞ 《现代汉语词典》的成功不仅仅因为有长期稳定的专业队伍、有科学合理的规划、有强大的学术支撑，更重要的是老一辈学者在编修过程中逐渐形成的“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、严谨求实的敬业精神、不计名利的奉献精神、齐心协力的团队精神”



左图 1958年参加《现代汉语词典》编辑的工作人员合影。
下图 60多年来出版的《现代汉语词典》“全家福”。
左下图 1960年由商务印书馆印出的《现代汉语词典》试印本。
（资料图片）

在许多人成长的道路上，都曾受益于一本辞书——《现代汉语词典》，有些人把这本书叫作“无声老师”“智慧的扁舟”。大概很多人还不知道，这本厚厚的词典已经走过一个“甲子”，在60年岁月里记录着我们的时代，积攒下一份“语言的史料”。

忠实反映时代语言

1956年2月6日，周恩来总理亲自签发《国务院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》，责成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（从1977年5月起改称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）编纂一部以确定词汇规范为目的的中型现代汉语词典。

为完成这一任务，原隶属文化部出版事业管理局的新华辞书社（《新华字典》的编纂机构）、原隶属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的中国大辞典编纂处（《国语辞典》的编纂机构）合并到语言研究所，与研究所部分科研人员一起，组建了40人的词典编辑室，由时任语言研究所副所长的吕叔湘先生兼任主任并担任《现代汉语词典》主编。

1958年夏，《现代汉语词典》开编。吕先生精心研究计划，组织资料收集和落实编写安排，制定并不断完善编写细则，主持编写工作，负责审稿定稿。1959年10月，初稿完成。1960年年中以后，试印本分8册由商务印书馆陆续印出，广为送审，为词典进一步修订和正式出版打下了坚实基础。

吕叔湘先生认为，词典是进行语言规范化的最重要工具，语汇研究的结果一般要由词典总结。一部好的词典在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中所起的作用难以估量。编词典大有学问。从选词、注音、释义、举例到语法特点和文体风格的提示，乃至条目的排列和检字法这些技术性的工作，都有很多问题，有的比较好处理，有的比较难处理。

1961年3月，丁声树先生接任《现代汉语词典》主编和词典编辑室主任。丁先生在音韵学、训诂学、方言学、语法学、文字学、词典编纂等方面都造诣颇深，著名语言学家朱德熙先生曾说丁先生“大概是主持、领导大型词典编纂的最理想人选”。丁先生夜以继日地工作，1965年试用本出炉。

据《现代汉语词典》第3版修订主持人单耀海先生回忆，丁声树先生曾说过：这部词典忠实反映我们这个时期的语言，给后人留下一份语言的史料。经过普遍调查，尊重语言实际，大家都这么说，词典就得承认它。

许多词条的背后，都有着耐人寻味的故事。吕叔湘先生主持编写的试印本中“自作自受”里的“作”注为阴平zuō，丁先生修订时一仍其旧。与此相反，对那些存在歧义的读音，尽可能定于一音。如“吐蕃”的“蕃”，吕叔湘先生主编的试印本只列fán一个音，“吐蕃”注为tǔfán。丁先生修订时为了照顾同“番”的应用实际，增加了fān音，“吐蕃”改注为tǔfān。当时有人向丁先生说“吐蕃”一读tǔbō。丁先生说“蕃”读两个音已经够繁难了，不要再增加读者负担了（《现代汉语词典》第5版对这一读音做了修订）。

《现代汉语词典》的使命是确定现代汉语词汇规范，用典范的白话文来注释。从收录一代语词、反映语言面貌来说，《现代汉语词典》是前无古人的。

编词典是“圣人的苦力”

《现代汉语词典》1965年5月印出试用本后，分送有关方面审查。1965年底到1966年春，根据反馈意见做了修改，稿子再次送交商务印书馆。这时，“文革”开始了，编辑工作停滞，直到1978年《现代汉语词典》才正式出版。从1958年开始编写算起，历经1960年试印本、1965年试用本、1973年内部发行本，整整20年之后才得以出版。而1978年出版以来，《现代汉语词典》又历经6次修订，目前已出至第7版。这本不足2000页的词典，凝结着60多年漫长岁月里几代语言学工作者的心血。

著名出版家陈原先生说：“词典不是人干的，是圣人干的。”这是个中人的切肤体会。据词典编辑室的老先生回忆，《现代汉语词典》当年的编写工作按流水作业进行，一环紧扣一环，一环卡住就要影响下边的工作，每项工作都十分紧张。编写人员每人每周要编写100条，一个组长一周要审改600条。作为主编的吕叔湘先生一周要定稿1500条，工作量相当大，晚上还要把稿子带回家里继续看。

当时吕叔湘先生住在中关村，单位在西单，上班来回都乘公交车，中午饭是从家里带的馒头就着开水吃。他的胃病越来越严重，后来做了手术。吕先生在《现代汉语词典》出版20周年学术讨论会发言中曾经这样感慨：我们编这部词典可以说尝尽了甘苦，或者说只有苦而没有什么甘。要编好一本词典，就得收集大量资料，比如编《现代汉语词典》就收集了上百万张卡片的资料，要对资料进行全面、认真的分析、综合，工作繁杂，当然十分辛苦。

吕先生把编《现代汉语词典》的“苦”概括为4个方面：一是人手生，参加编写的人大都没编过词典，要边干边学。二是工作生，这类词典前人没有编过，没有严格意义的词典可以参考。三是时间紧，要在一两年内完成四五万条的编写任务。他说自己在一年多时间里差不多每天都要工作到夜里12点钟，又不能太晚了，因为第二天还得早起照常工作。四是干扰多，一次次运动耗费不少时间……先生感慨地说，“这本书出版以后，适合社会需要，读者反映不错，这使得我们心里感到安慰，也可以说就是我们的‘甘’吧”。

词典越编，胆子越小

吕叔湘先生说，词典工作“是不朽的事业”。词典是供人们识文断字、解疑释惑的工具，一定要求真务实、避免错误。

丁声树先生说过：“我总觉得词典越编胆子越小，常会出错。”每一个词条背后都需要细致深入地思考和研究，《现代汉语词典》的编者靠着一种对学术谦恭和谦卑的态度，确保进入词典文本的都是精挑细选、千锤百炼的，让读者在最节省的篇幅和最简短的时间里获得最有价值的知识。

上世纪六七十年代，我国的词典事业还处在一个新发展的初期。接替吕叔湘先生担任《现代汉语词典》主编的丁声树先生深知，需要大力培养青年人。他曾说：“我要向一些老科学家学习，发扬做人梯的精神。”他不仅在工作中扶持年轻人，而且在生活上也像父辈一样关心。1967年，单耀海因病住院近两个月，在北京单身一人。丁先生每周日下午都到医院探望，病友们都以为他是单耀海的父亲。后来，已是耄耋老人的单耀海回忆起往事仍然感慨不已：“几十年前的往事，今天想来，犹历历在目，心底里也觉得不论是工作学习生活各个方面，父亲对我也不过如此。”一个月前单耀海先生刚刚去世，令人唏嘘。

《现代汉语词典》的成功不仅仅因为有长期稳定的专业队伍、有科学合理的规划、有强大的学术支撑，更重要的是老一辈在编修过程中逐渐形成的“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、严谨求实的敬业精神、不计名利的奉献精神、齐心协力的团队精神”。学界甚至由此形成一门专门研究《现代汉语词典》的学问，叫“《现汉》学”。

在当下全球化、信息化浪潮的挑战下，《现代汉语词典》不能再囿于国内市场和纸本词典。2017年，中国社会科学院辞书编纂研究中心正式成立，给辞书编纂与研究搭建了更高的平台。同时，语言研究所新设立了新型辞书编辑室，研发数字化辞书和面向国际汉语教育的《现代汉语词典》学习版。另外，商务印书馆研发的《现代汉语词典》第7版App即将面世。在国际传播方面，汉英双语版的翻译工作已接近完成，商务印书馆与牛津大学出版社联合组建了国际编辑部，来推进这个项目的进程。同时，格鲁吉亚语版、阿拉伯语版、俄语版、西班牙语版、波斯语版的翻译工作也已经开始启动。希望《现代汉语词典》这部记录和承载中华文化的国家文化重器能够走出去，助力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，在新的时代续写新的辉煌！

（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辞书编纂研究中心秘书长、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主任）

探访

此地犹余化民台

□ 艾 芳 王新生

中原传统文化是中华文化的源头，以河南为代表的中原地区逐渐孕育了厚重博深、辉煌兴盛的古代文化。在我国几千年的历史文化进程中，中原文化以其强大的生命力深刻影响着历代中原人的精神和灵魂。

前不久，我们走进河南省周口市扶沟县。这里有一条名叫“书院街”的幽静小巷，巷内坐落着历史悠久的“大程书院”。它是扶沟厚重历史的标志，也是宋代理学的重要传播阵地。据介绍，大程书院始建于宋代，为程颢在扶沟时所建。

程颢是北宋哲学家、教育家、理学奠基人。北宋熙宁八年（1075），程颢从洛阳来到扶沟担任知县。他无论在什么地方做官，都尽其所能兴办学校，引导当地百姓读书知礼。据《宋史》记载，程颢任晋城令时，“乡必有校”，“择子弟之秀者，聚而教之”。来到扶沟后，程颢在县城创立了一所书院。为了培养优秀人才，程颢不但亲自讲学，还请胞弟程颐等人来此讲学。一时扶沟文风兴盛，从全国各地前来求学的士人络绎不绝。

程台又名“化民台”。程颢在扶沟做知县时，“专尚宽厚，以教化为先”。在他任内，本是强盗出没频繁的扶沟竟“无强盗者几一年”。程颢对滋事生非、悖理违法之人，不用刑罚，而是以儒家的处世立身之道引导与感化他们。“化民台”相传便是程颢讲道劝善之地。

讲解员告诉我们，后人敬仰程颢教化苍生的努力，在化民台上留下了许多题咏。清朝康熙年间一位官员在化民台上留下了一首长诗，其中有这样四句：“如彼召伯棠，孰忍施斤斧。如彼羊祜碑，瞻望泪如雨。”站在化民台上，他想起了西周的召伯，相传他曾在甘棠树下处理政事，百姓思念召公善政，见甘棠树而不忍砍伐；他又想起了魏晋的羊祜，他治理襄阳，深得当地百姓爱戴，在其逝世后，百姓立碑纪念，每当见到“羊公碑”时，人们便不禁潸然泪下。扶沟百姓对程颢，也正是这样一种朴素而浓烈的情感。

扶沟地势较低，每年都有水旱灾害，给百姓生活带来了很大困难。程颢上任后花费了很大精力“经画沟洫”。虽然在他去职前，尚未动工修建已经规划好的水利设施，但程颢认为这是一件“前人栽树，后人乘凉”的事。他说：“以扶沟之地尽为沟洫，必数年乃成。吾为经画十里之间开其端，后之人知其利，必有继之者矣。”程颢的目的很明确，就是要为扶沟的治水事业开个好头，使后人知其利，这样才能把治水事业进行到底。

宋元丰三年（1080），程颢罢扶沟知县，几年后转任监汝州酒税。史载：“先生之去县，不使人知，老稚追及境上，攀挽号哭不肯去。”清代一位在扶沟做官的人，在一首古诗中写道：“一自汝州监税去，犹余此地化民台。”其实，程颢留在扶沟的岂止是一座化民台，又岂止是一座大程书院？他还留下了嘉惠后学的思想、视民如伤的情怀和正直无私的品格，这才是一笔弥足珍贵的文化遗产。